



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58年至1969年的 工人罢工

【南】奈察·约万诺夫 著

K525.22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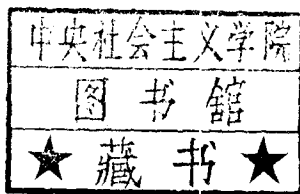
58839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58年至1969年的工人罢工

〔南〕奈察·约万诺夫著

黄良平 丁文琪译

（内部发行）



200225363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Prof. dr NECA JOVANOVIĆ

Radnički štrajkovi
u Socijalističkoj Federativnoj
Republici Jugoslaviji
od 1958. do 1969. godine

Beograd 1979.

根据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79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译出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58年至1969年的工人罢工

〔南〕奈察·约万诺夫 著

黄良平 丁文琪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81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98 定价：1.70元

（内部发行）

107-125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有朝一日，我将从思想上回顾
自己的整个一生。您的友情，是我
永远不会忘怀的幸福。

奥加辽夫致赫尔岑

出版说明

南斯拉夫法学博士、南共联盟中央机关刊《社会主义》杂志编委奈察·约万诺夫教授，是南斯拉夫专门研究罢工问题的有数的学者之一。

本书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列宁有关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条件下罢工的思想 and 南斯拉夫官方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罢工立场，分析了南斯拉夫学术界、工会干部和工人们对于罢工的观点，分析了对罢工发生重大影响的矛盾，介绍了国家机关有关南斯拉夫这十一年间罢工的材料，详细论述了南斯拉夫这一期间罢工的原因、经过、工业部门和地区分布情况、冲突的实质、工会组织及工人对罢工的看法、舆论的态度以及社会后果。书中列举了丰富的数字、图表、材料，介绍了南共联盟和政府就罢工问题作出的结论。

奈察·约万诺夫教授发表过专著和论文一百五十余种，一九八〇年曾来我国讲学访问，受南共联盟中央委托，同《红旗》杂志编辑部举行了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座谈。他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本书，一九七四年脱稿，一九七九年出版。这是南斯拉夫研究罢工问题的仅有的学术著作，是约万诺夫教授的博士论文。对于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罢工问题，该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作 者 的 话

从1958年直至今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断发生罢工。然而，对这种现象并未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解释。为了说明罢工的真正的性质和罢工对自治的现状与设想所具有的意义，需要比较全面地研究一下罢工的现象。

首先，对罢工进行科学的、社会学的研究，是科学本身、尤其是社会学的需要和义务。同时，南斯拉夫社会的领导力量主观上也对罢工问题的科学研究表示关心，以便在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争取排除罢工的真正原因。这就是我决定来研究工人罢工的缘故。

我对研究罢工怀着一种好奇心，这是不容讳言的。我对研究罢工感到兴趣，首先是因为，这些罢工发生在一个工人阶级正式掌权和实行工人自治的社会中。寻找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如走进一座迷宫，要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研究罢工，努力深入考察这一现象的真正性质。因此，选择方法论的步骤，不仅取决于研究者的意图，而且首先取决于罢工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常设政治机构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和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对于罢工（1969年罢工表现得尤其激烈）进行研究的意向，大大便利了对有关这一现象的第一手材料的收集。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勇气和能力来认识本身真相的社会，不是健全的社会。他亲自示范，公开写道，“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

应该了解，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罢工进行科学研究和公开讨论，首先是因为需要分析和说明这一现象，以便明确这一现象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历史形势下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能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把对罢工的研究和公开讨论看成是“丑事”。

利用比较少的几块骨头，可以复原古象的化石。当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奢望，想用这部书稿去改建整个社会制度。但是，我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意图，就是要把罢工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说明它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状况有怎样的联系，在多大的程度上受整个社会制度状况的制约。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不能由我自己来估计。

从1965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工人罢工问题。那一年，我写出了关于工人罢工问题的第一篇文章。

在研究工人罢工期间，尤其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约热·哥里查尔教授和博士的许多帮助。他提出了许多建议和看法，才得以使本书在内容上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谨借此机会，对他给予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在统计整理材料时，我的同事德拉戈斯拉娃·米特罗维奇给了我帮助。对此，谨向她表示感谢。

本书文稿由奥里亚·科夫里维查同志打字，由维拉·雅克什奇同志负责整理和复印。谨借此机会，一并向她们表示感谢。

特别要感谢维尔卡·丘尔契奇同志，她迅速地校读完了文稿。

1974年8月

于贝尔格莱德

感谢苏博提察市“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工人大学，由于该校在印刷方面提供经费，使本书得以迅速出版。特别要感谢德拉

干·米利科维奇同志，他承担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印刷的全部工作。

在苏博提察市“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工科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科学讨论，对本书起了促进作用。对此，谨向该工科大学表示特别的感谢。

奈察·约万诺夫教授和博士

1979年6月1日

于苏博提察

前 言

奈察·约万诺夫博士所著的本书，对于在许多方面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社会背道而驰，但又相当微妙的现象，即对南斯拉夫1958年至1969年期间的工人罢工，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作者以他社会学家的研究艺术，涉及了整个这一现象，并将多年研究的成果，首先作为博士论文，在卢布尔雅那大学法律系提出：在顺利答辩的基础上，他被授与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他将这些成果拿出来，和更广泛的有兴趣的公众见面。应该指出，作者是以一位献身于社会主义自治民主事业的科学工作者的严谨态度，去处理南斯拉夫经济部门劳动组织的罢工这一微妙题材的。

表面上看来，也许可以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研究的成果已经过时而没有现实意义，因为这里研究的那段历史在十年前（1969年）就结束了。但是，正如作者在1977年和1978年期间对南斯拉夫几家有声望的杂志发表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最近十年来发生的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和更深刻的原因，实质上仍然和前十年促使工人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和更深刻的原因是同样的。因此，无论从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上，或者在社会政治的意义上，本书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

作者作出了努力，既根据第二手材料，也根据在调查研究

中亲手收集的第一手材料，从理论上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罢工加以说明。这方面特别要注意他的两项研究，即对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64年1月1日至1965年9月1日和1966年至1967年这两段时期的研究，以及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境1958年1月至1969年9月这段时期的研究。从方法论和理论上看，这两项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平。作者在分析罢工这一中心现象的同时，不得不涉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按其根源、原因、过程和后果来看，南斯拉夫社会中工人罢工的现象相当独特，根源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结构因素。所以，需要同时研究其他一些极重要的社会现象和过程。

作者首先研究了三类问题：

南斯拉夫1958年至1969年期间罢工的性质，即罢工的社会实质以及罢工的特点，如罢工的频率，罢工在南斯拉夫全境地域上的分布情况，参加各次罢工的工人人数，这些工人的工作岗位等；

包含罢工原因的社会结构和环节，作为罢工的直接导火线的情况；

罢工给罢工者和发生罢工的企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带来的后果。

作者的研究是从下列设想出发的：

罢工反映工人阶级和官僚势力之间类似于阶级的对抗。在革命的影响下，首先是在自治的影响下，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变化，在很多方面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传统的”工人阶级有所不同。但是，参加所有各次罢工的首先是生产工人，无论对这一社会阶层作怎样的说明，他们都属于工人阶级：

罢工可能有两类原因：一类是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因（资产阶级的残余，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开展）；另一类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原因（官僚势力，技术统治势

力^①，社会权力在这些势力手中的集中）。

作者进行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第一条设想，而推翻了第二条设想的前一部分，但关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不开展的意见除外。所研究的罢工，没有一次是由于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敌人残余的活动引起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官僚势力和技术统治势力发展和形成为阶级对抗的“对立面”，工人才举行罢工的。

在评价这些看法以及整个书稿时，必须考虑到，作者研究的是六十年代的罢工。这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时期（自由主义给社会主义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和有害的后果），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向对抗自治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抉择采取众所周知的行动的时期，是修改宪法之前的时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是论述南斯拉夫社会第三个十年的某些特点的科学文献。此外，某些看法直接涉及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导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发生“革命队伍的腐化”。作者关于脱离生产者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中心的作用的看法，尤其值得一提。

作者认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权力以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他们的眼前利益。这种分配的特点在于，名义上属于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社会权力，绝大部分却掌握在领导人员和专家手中。于是，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人之间便产生了冲突。作者说明导致这种状况的过程时，援引了一些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社会政治共同体议会中工人的人数在减少，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由工人担任主席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同时，工业社会学对自治机构中影响的构成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人在自治机构中

① “技术统治势力”一词出自希腊文，由“技术”和“统治”两个词根构成。根据外文辞源和南斯拉夫当代条件下特定的贬义，严格按原文译为“技术统治势力”，在原文带有“主义”的后缀时译为“技术统治主义”。这样较为适宜，所以这里没有沿用“专家治国论”或“技术至上主义”的译名。——译者注

的代表性本来就比较小，而在决定问题方面所起的真正影响甚至更小。换句话说，和企业的所谓领导机构相反，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工人委员的真正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作者从两个方面，即既从单个企业的方面，也从整个社会制度的方面考察了罢工的深刻原因。作者断定，几乎占半数的罢工，其深刻原因都在企业外部，在所谓的宏观方面，也就是在于整个社会制度。与此相联，作者断言，罢工首先是整个社会中现实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果，国家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和不受调节、或多或少自由化的市场作为一方面，自治作为另一方面，在原则上是不相容的。

作者认为，罢工的深刻原因既在于微观方面，也在于宏观方面。由此出发，就涉及到各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问题。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强调指出所研究的这个时期中罢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说，无论从地域的意义上说，还是从各个生产部门的角度看，没有一次罢工超出了单个劳动组织^①的范围。此外，比较多的一部分罢工并没有包括整个企业，而只是在企业内部个别经济单位的范围内举行，其他单位的工人在罢工时继续工作。

关于罢工的主体，即这一冲突过程的代表者，作者得出结论说，一方面是生产工人，另一方面是单人业务领导机构（经理和其他领导人员）和集体自治机构。其中，占第一位的是单人业务领导机构，即所谓的领导，占第二位的是这些机构和集体自治机构一起，占第三位的才是集体自治机构。至于按罢工者的专业熟练程度说，罢工者最多的是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占末位的是高度熟练工人。

^① 劳动组织是由若干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基层组织相当于车间或小厂）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自由联合组成的，相当于大厂或总厂。若干劳动组织通过签订自治协议，自由联合组成联合劳动复合组织，相当于联合企业。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复合组织，总称为联合劳动组织。——译者注

作者揭示，引起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即促使工人决定举行罢工的具体环境，首先在于工人的恶劣的物质生活状况，这种状况在某些劳动组织内长期存在。对于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整个南斯拉夫进行研究的材料，都说明这一点。作者认为，大多数经济部门劳动组织以及某些整个生产部门的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较低。这首先是因为经济部门较低的生产能力和当时整个分配制度所保持的较弱的自治经济基础造成的。就是说，银行资金迅速增长和独立^①，相比之下，经济部门则处于相对贫困化的过程。

作者认为，在经济权力和所有制关系这种结构的范围内，既产生罢工的深刻原因，也形成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在这方面，深刻的原因表现在，生产工人由于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劣，产生了罢工的念头。由此出发，作者再次断言，举行罢工的人们，按其社会实质和社会地位来说，客观上属于这样一部分工人阶级：官方的政策多年来向他们发出号召，口头上答应不仅要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要加强他们在决策方面——不但有关他们自身，而且有关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应该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举行罢工的主要是生产工人，而按照政策宣布的那样，这些工人恰恰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代表者和保证者。这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这个问题促使作者去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中工人的真正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在社会权力中心内对决策的真正影响。因此，作者综合地考察了对经济部门劳动组织的分配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成果。结果表明，这种影响是由于严格的等级制结构造成的。不合理的社会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

① 在南斯拉夫全国的投资基金中，银行所占的比重从1961年的0.9%迅速增至1972年的50.9%。卡德尔在1973年关于修改宪法的重要讲话中曾经强调指出，这些游离出来的社会积累资金开始在很大的程度上在银行等一定的管理者上层手中独立存在，日益逃避工人的自治监督，并且离开国家机关的实际监督和引导。——译者注

有关。作者断言，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差别首先有损于在社会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那个社会阶层，即有损于从事生产的工人。

作者在考察工人作出决定的能力（在就各个问题作出决定的过程中，工人会遇到许多选择方案以及“赞成”和“反对”这些选择方案的论据，特别会想到所提出的每一种选择方案的后果，要有能力应付），工人对于作出的决定的责任，罢工在微观方面的原因等问题时，在对上述调查研究的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罢工的直接导火线问题作出了最后的回答。就表现的形式而论，罢工的直接导火线和罢工的深刻原因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作者断定其中还是有某种吻合的情况。在四百一十九次罢工中，个人收入问题是所有这些罢工的直接导火线，也是其中二百八十五次罢工的深刻原因。生产工人在正式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代表性和影响，他们的整个社会地位，这中间有着互为因果的联系。在这方面，作者认为：“工人由于个人收入的菲薄和减少而举行罢工，同时也就是在客观上对于自己在常设社会权力机构中所处的不相应的地位表示不满”。

诚然，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并不是罢工的唯一的直接导火线。作者确定，罢工还有下列原因成为直接导火线（按出现的频率列举）：工人要求迅速实现（包括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自治和获得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要求企业的领导人员承担责任或加以撤换；要求改善劳动组织在分配制度和经营条件方面的状况。

然而，在这里的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无法确定，敌对活动是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或深刻原因。

至于工人在多大的程度上打算用其他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要求，作者认为，只有在四分之一稍多的情况下，罢工才是工人们不得已采取的最后手段。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工人都是在利用其他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以前，就通过罢工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在

罢工者的要求是否合理方面，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半数以上罢工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四分之一罢工的要求是部分合理的。这个结论同下列情况相符：在半数以上的罢工中，罢工者的要求完全实现；在五分之一罢工中，要求得到部分的满足。

* * *

本书作者是从五金工人开始自己的生活道路的；后来，他经历了共青团委员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区委员会、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的“旅途”。他是从本人当过的生产工人的立场来研究罢工问题的。可以说，字里行间都令人感到他的“工人精神”。几个月前（1978年3月），他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但却怀着工人的感情和本能这样说道：“如果自治利益多元主义的概念是指发扬民主和提供广阔的场所，以便在制度的机构、共同体和政治组织的范围内表现和指明不同的利益，那也就意味着加剧社会上冲突的紧张局面。我们的制度在这里将经受考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民主化到这样的程度，以便能够表明不同的利益；而是在于，要经受考验，表明是否能够在制度的组织、共同体和机构内部，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和协调这些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利益，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在外部去解决。迄今为止，我们曾经听任不同的利益（包括罢工）在制度和机构外面去表现，甚至既同机构，又同制度交锋，一旦发展到了威胁制度的地步，又去用不太民主的手段予以解决。”（《起点》杂志1978年9月6—20日第251期第15页）

毋庸置疑，奈察·约万诺夫博士的这一著作至少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南斯拉夫社会中的冲突，提供了某些根据。

约热·哥里查尔教授和博士

1978年11月

于卢布尔雅那

导 言

列宁论“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 采取罢工斗争……”

对于一般考察过渡时期的国家（这种国家是在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产生的）中的罢工，列宁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一文^①有重要的意义。列宁的这篇文章同时也是《俄共（布）中央1922年1月12日的决议》。通过该决议前，1921年1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研究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列宁起草了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共分十二条，并于1922年1月4日将此草案提交中央的特设委员会。此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1月12日一致采纳了列宁的草案作为基础，作了某些修改，委托列宁、季诺维也夫、安德列耶夫和布哈林对决议案作最后的修订”^②。列宁写的这个草案的第四条的标题是：“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私有制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经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82—593页。

② 《列宁选集》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60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第14卷，第705—706页。